

马恩列斯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二辑（上）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马恩列斯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三编 文艺理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恩列斯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 二 辑

上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 …	(1)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 …	(7)
马恩列斯有关论述摘编	(15)
1848—1849年德国革命	(15)
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社会各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	(29)
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68)
莎士比亚和席勒	(85)

附 录

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的信 (1859年3月6日)	
附：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	(93)
斐迪南·拉萨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 (1859年3月21日)	(108)
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的信 (1859年3月27日)	(110)
斐迪南·拉萨尔 弗兰茨·冯·济金根	(145)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前篇	(399)
莎士比亚 亨利四世后篇	(493)
莎士比亚 维洛那二绅士 (第二幕第三场)	(591)
莎士比亚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第一幕)	(593)
歌 德 葛兹·冯·伯利欣根	(611)
席 勒 西班牙王子唐·卡罗斯	(73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①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②：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③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① 1859年3月6日拉萨尔把他的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寄给马克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还附有他的《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一文，系统地表达他对悲剧的观点。同年3月21日，他又给恩格斯写了信，征求对剧本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同年4月19日和5月18日给拉萨尔写了信，批判了拉萨尔在剧本中反映出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文艺观。

② 拉萨尔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拉萨尔伪装进步，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与《新莱茵报》建立联系，并跟马克思接近，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主张依靠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反对工农联盟。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在剧本《济金根》中有明显表现。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已经大致指出了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未来分歧的线索”。1863年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成立，拉萨尔窃据主席地位，他把一整套机会主义观点塞进了联合会章程。他主张通过议会和普选的“和平和合法的方式”，使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的国家”；依靠反动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求得工人经济上的解放；污蔑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卖身投靠反动头子俾斯麦，成为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1864年拉萨尔与人决斗中死亡。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形成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马克思从1863年前后就开始公开批评拉萨尔的错误，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③ 荷兰兄弟 指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约翰·卡尔尤塔。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④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④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

④ 弗里德兰德 马克思·弗里德兰德(1829——1872)，拉萨尔的表弟，维也纳《新闻报》编辑，曾请马克思为《新闻报》写文章。

④ 宪章派 1836年英国工人创立“伦敦工人协会”，掀起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并于1838年公布名为“人民宪章”的政治纲领，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被称为“宪章派”。人民宪章包括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为保障工人享受此项权利而规定的一系列条件。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英国工商业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使得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日益增长，工联领袖不再支持宪章运动，因而宪章运动逐渐衰落。

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⑤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⑥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珂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珂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

⑤ 骑士 中世纪欧洲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下层，即低级贵族。他们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大领主所赐的领地。他们剥削农民，镇压农民起义，参加掠夺和侵略战争。骑士制盛行于 11—14 世纪。后因封建制度的解体和射击武器的广泛使用，逐渐衰落。

⑥ 葛兹·冯·伯利欣根（1480—1562）德国骑士，曾怀自私目的参加德国农民战争，被选为华农民军的首领，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致使战争失败。歌德把他作为自己剧本《葛兹·冯·伯利欣根》的主人公，着重描写了他与诸侯皇帝的冲突和与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 1830 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⑦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

⑦ 1830 年有教养的波兰贵族 指 1830 年开始的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波兰小贵族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恩格斯认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待农民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所领导的起义中对农民的态度相似。

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
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
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71—575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①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我

①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名利场》、《潘登尼斯》、《纽可漠一家》等长篇小说。

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②——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知道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③,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做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

② “书有自己的命运”这句话引自忒伦底乌斯·摩尔的《论贺雷西的用词、音节和韵律》。

③ 卡尔·济贝耳(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

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承认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

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④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⑤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

④ 约斯·弗里茨是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中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这个人物的原型是16世纪初德国南部农民的秘密组织和革命活动的杰出组织者。

⑤ 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两剧中的人物，是个封建关系崩溃时期堕落的贵族骑士的典型。莎士比亚通过福斯泰夫联系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为剧本提供了一幅丰富的社会背景。“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即“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

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⑥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⑥ “鞋会”和“穷康拉德”是15世纪末德国农民的秘密革命组织。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⑦狂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复灭，从《十字报》^⑧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⑨，从莱希堡^⑩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⑪”。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

⑦ 条顿，一个古代的种族，居欧洲北部，今之德国人是其后裔。

⑧ 《十字报》即《新普鲁士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因报头印有十字，又被称为《十字报》。

⑨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后流亡伦敦，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⑩ 约翰·伯恩哈特·莱希堡（1806—1899），奥地利反动首相和外交大臣。

⑪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这些人都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恩格斯这里引的是当时南德意志流行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这首歌曲的副歌是：“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